

藝術手冊

文人畫的現代命運

2014

總策劃 / 胡國印

主編 / 黃紀蘇 祝東方

副主編 / 王東聲

藝術總監 / 王煥青

中國書店

藝術手冊
文人畫的現代命運

2014

總策劃 / 胡國印

主編 / 黃紀蘇 祝東力

副主編 / 王東聲

藝術總監 / 王煥青

中國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人画的现代命运·艺术手册. 2014 / 胡国印策划;

黄纪苏, 祝东力主编.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4.8

ISBN 978-7-5149-1151-0

I. ①文… II. ①胡… ②黄… ③祝… III. ①艺术—
研究 IV. ①J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532 号

书 名 / 文人画的现代命运·艺术手册·2014

总 策 划 / 胡国印

主 编 / 黄纪苏 祝东力

副 主 编 / 王东声

艺术总监 / 王焕青

责任编辑 / 岂 航

封面设计 / 张 琳

装帧设计 / 北京华夏嘉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 版 / 中国书店

地 址 / 北京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 / 100050

发 行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规 格 / 开本787×1092 1/16

印 张 / 11

字 数 / 147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149-1151-0

定 价 /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者的话

20 世纪 80 年代，诗歌、小说、美术、戏剧、电影等各领域，彼此的边界并不清晰，人们相互观看作品、参与运动，那时候文艺界曾拥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空间。追根溯源，是由于不同的艺术形式在当时都分享着一个名为“改革”或“现代化”的共同的时代命题，正是这个时代命题支撑了那个精神空间。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这个共同的空间不复存在。各文艺类别回归各自领域，分途而行。共同的时代命题消失了，直接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内容的苍白、肤浅，以及形式技巧的华丽或堆砌。时代命题构成了一个时代美感的内核，而这种精神性的美感，是一种最关键的要素，对文学、美术、戏剧、音乐、建筑等各门类艺术起到统摄的作用——也就是说，小说与雕塑、音乐与建筑，舞蹈与篆刻，等等，彼此之间的“重合”之处就在于这种精神性的美感，因此，它们才能统统被归属在“艺术”的范畴之内。否则，如果纯粹从形式、媒质和技术看，文学与公文、舞蹈与体操、建筑与土木工程，反倒有更多共通之处。

在这个炎热的夏季，我们编辑了这本《文人画的现代命运·艺术手册·2014》，以继续寻找这样一个共同的精神空间。本册论及文学、戏剧、美术、书法、电视、建筑等，例如运动式的文学发展方式、冷战时期反乌托邦小说的思想表达，例如当代戏剧的现状和传统戏曲的改造，例如文人画的现代命运，以及如何解读一部电视剧，等等。我们希望从这些不同的艺术领域和角度出发，在某个交汇点上，发现并表达新的共同的时代命题。

目 录

CONTENTS

- | | | |
|-----|-----|--|
| 001 | 鲁太光 | 文学需要运动
——当前文艺创作动态观察之一 |
| 013 | 赵柔柔 | 冷战与“反乌托邦”
——对读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与道洛什·久
尔吉的《1985》 |
| 031 | 黄 觉 | 戏剧和剧场的历史碎片
——李畅访谈 |
| 055 | 陶庆梅 | 当代戏剧的格局 |
| 075 | 张晴滢 | 光复旧物、推陈出新
——作为现代经典的样板戏 |
| 091 | 座谈会 | 文人画的现代命运 |
| 123 | 孔庆东 | 解读《民兵葛二蛋》 |
| 139 | 易介中 | 创意之常道 |
| 147 | 语 冰 | 艺术与思想断章 |
| 155 | 梁培先 | 沃兴华：升腾还是陷落 |

文学需要运动 ——当前文艺创作 动态观察之一

鲁太光

中国作协《长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文学——其实可以扩大为文艺——需要“运动”！

这是个容易得罪人的题目，因而，最好从一件容易得罪人的事情说起。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远——2013年12月21日。而且，就我们纷纭复杂的生活以及其间次第发生的一件件可能深刻改变我们未来生活的政治、经济、社会“大事”来说，这件发生在文学界的事，很可能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即使在文学界，有多少人关注、关心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就文学界而言，这或许又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这很可能是文学界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一种“隐疾”在今天这个特定时刻的集体无意识的反映。

先把这得罪人的事说出来吧：“河北四侠”创作研讨会在京召开。

“河北四侠”，指的是河北的四位中青年作家胡学文、张楚、李浩、刘建东，他们被河北文学界乃至国内文学界的一些人视为河北文学的新势力，是河北文学的希望之所在——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而，为他们开作品研讨会，不仅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且，在文学日益边缘化，愈发“贬值”的今天，这还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过，有一点让人觉得别扭，就

是研讨会的命名方式，即“四侠”的命名。

我在网上简单查了查，觉得河北作协及相关人士推出这个文学命名，还是很下了一番工夫、很费了一番心思的：大致在2012年，河北省文学界就提出了这个命名，并且做了阐释——因而，北京的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读为河北作协想在全国推广这一命名。在他们的阐释中，这四人之所以被命名为“四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侠”映射着浓郁的河北地域文化色彩，即“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意思，这四位“文人”在写作精神上颇有这种“武人”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探索意识，还有，抗拒流俗的意识。经由这样的阐释，作家的写作精神与地域文化挂上了钩，确有一定见地。问题在于，这四位作家的写作风格歧异太大了，在笔者看来，除了在写得较“好”这点上有共同之处，其他的方面甚至给人冰炭不能同炉之感——比如，胡学文的小说十分注意内心与现实间的紧张感，更“现实”些；而李浩的小说则更注重形式与内容间的紧张感，更“纯粹”些；张楚的小说，关注的多是情感与精神间的紧张感，更“细腻”些；刘建东的小说，关注的多是纪实与虚构间的紧张感，更“飘忽”些；因而，用

一种统一的命名来概括他们，只能大而化之，经不起推敲。

在一些人眼中，这种文学命名方式或许有令人眼前一亮之感，可实际上，只要略微深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文学命名方式不仅早就不那么“新鲜”，而且有“过时”之虞——早在十多年前，“宁夏三棵树”的命名方式，在文坛，的确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紧随其后，“甘肃八骏”的文学命名也渐次在文学界叫响。看到这儿，有读者也许会问，同样的文学命名方式，何以有褒有贬，态度不一呢？原因十分简单，十多年前，这样的文学命名方式还有

思想的活力，还有在分散的文学世界寻找共性的文学冲动，而且，早期的“宁夏三棵树”，在精神上的也确有相当强的共鸣之处，这样的命名也就的确有生命力。

可惜，今非昔比。如今，“宁夏三棵树”、“甘肃八骏”早就成了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品牌，成为该地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的招牌，几乎每隔几年就要换一批人。因而，笼罩在这两个名号下的作家，没有一百，也有几十了，其文学共同性/共通性，早就在人员的扩大中弥散殆尽，而这些命名方式所蕴含的思想冲动，也早已没影了。说得难听点儿，这样的命名方式，早已与文学无关，而沦为纯粹的“数字游戏”，其最大意义，也不过在于显示地方作协或文联推举本地作家，尤其是有实力的中/青年作家，使其走向中国文坛的努力及效果。

如果说这种命名方式还有点儿比喻色彩和形象意义的话，那么，诸如“70后”之类的文学命名，则更是纯粹的“数字游戏”。客观地看，作为一个作家群体，“70后”不是“命名”的，而是“被命名”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诸如“50后”、“60后”、“70后”、“90后”等所谓的文学命名，都有一个参照物——“80后”。同样客观地看，毫无疑问，“80后”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命名，甚至可以说是1990年代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文学运动。这样说，自然有其依据，那就是：所谓的“80后”，其实是消费主义文化与青春文学在当代中国



耦合的一个产物，说得更直白点儿，“80后”是消费青春的产物。从这个层面看，这一文学命名或文学思潮，不管在内涵上，还是在外延上，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内涵上，正如我们上文所说，这一文学活动的关键词在于“消费青春”，因而，它倡导的是“轻阅读”，是“青春阅读”，其作家群体也多是韩寒、郭敬明等青春偶像——尽管“80后”火爆后，不少生于那十年的写作者也都有意无意地把这个标签往自己身上贴，可实际上，大家都心知肚明，真正的“80后”就那么几个人。而在发展趋势上，随着“80后”逐渐青春不再，其作品中的“青春”色彩也必将越来越多地为“消费”色彩所遮蔽、淘空——这一情状，正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与这一内涵相适应，“80后”的一个重要外延性存在就在于这一文学命名主要是由“资本”——说白了就是“书商”——操控产生的，当然，离不开一些文学人士的参与与包装，而这些“80后”作家，也主要是“资本”——说白了，还是书商，最近，这些攒书的，有的又去攒电影、电视和网站了——包装的结果。说得难听点儿，“80后”之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光芒灿烂，就是因为他们是“镀金的一代”，不管其文学心灵如何，躯壳是光亮的。

与“80后”相比，“50后”、“60后”、“90后”，尤其是“70后”，很难说是一种文学命名方式，更不要说是一种文学思

潮了。前不久，读到一篇大概是“70后”的评论家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很是为“70后”叫屈，也很是为“70后”叫好。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把“70后”这两年的文学成绩与其他“零后”，尤其是“50后”做了一个比较，说“70后”已经超越他们了，已经成为当下文坛的主体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自然另当别论。可是，这种论证方式就让人觉得不那么恰当——他为“70后”呼喊的心我是认可的，我也有这种冲动。的确，这几年，“70后”的创作相对活跃，尤其是在中短篇小说方面，也有一些“70后”作家推出了有一定重量的长篇新作。但还是我上面说的，“70后”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命名，甚至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文学群体，因为，除了在年龄上都是那会儿生人，在文学创作上实在很难再找出什么共同或共通点来。他们的创作，说是千人千面，实在是一点儿也不过分，而且，整体看来，这些作家的创作也相对不稳定，同一个作家，今天写这个，明天写那个，后天又写别的去了，你很难知道他创作的核心点在哪里，而且，其作品质量也相当不稳定，突然一篇小说让你心动不已，突然一篇小说又会让你郁闷不已。这样一个自己人之间都没法比的群体，我们竟拿出来跟其他文学群体——“50后”、“60后”倒是更具有可通约性——相比，实在勉强。

写到这儿，问题的核心水落石出，也就是说，笔者之所以对“河北四侠”、“70

后”等“数字游戏”式的文学命名不以为然，是因为在这种习惯成自然的文学命名方式背后，隐藏着当下文学创作危机的根源所在：没主体，没创意，没思潮领路，没运动支持。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以所谓的“70后”为代表的作家们的创作，是一种懒惰的创作，是一种缺乏主体性的创作，是一种缺乏活力的创作，更有可能，是一种没有远大前途的创作。

不久前，王安忆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个主题为“小说的生活”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她对自己那一代人的创作，进行了深情回望，认为自己那一代作家——50后——“很有气象”，“都是有才华的人”，而且，“那批人的才华远远超过今天的70后、80后，包括60后”，她还说，“现在我回过头去看八九十年代的小说，90年代是高潮，那个小说写得真是好，相比来说，今天的摊平了真是单薄很多。”

不知道其他人，尤其是“60后”、“70后”作家是怎么看待王安忆提出的观点的，即1990年代是中国小说创作的“黄金年代”，这个“黄金年代”的形成，在于“50后”的“才华”——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就是：“50后”的创作远胜于“60后”、“70后”。我个人很认可王安忆的观点。无论如何，199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

之一。也无论如何，综合起来看，“50后”的文学实绩的确远胜于“60后”，尤其是“70后”——当然，对“70后”来说，这话说得可能有点儿早，因为他们的路还长着呢，但从“气象”上看，“70后”的确不如“50后”，乃至“60后”。

不过，有一点我不认可王安忆，那就是她把“50后”强于“60后”、“70后”的原因给神秘化了，以“才华”和“气象”这种不靠谱的词予以解释。这么说过于笼统，不大容易理解。不过，只要换个说法，问题或许就清楚了：既然“50后”强于“60后”、“70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才华”和“气象”，那么，这“才华”和“气象”从何而来？难道老天只眷顾“50后”，而抛弃了同是作家的其他诸“零后”吗？

在笔者看来，“50后”之所以在“才华”和“气象”上强于“60后”、“70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能力，而这思想能力，又得益于他们经历了众多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这些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有时候，他们是被动参与的，有时候，他们是主动发起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受益匪浅。即便没有直接介入这思潮与运动，但整体氛围的潜移默化他们是免不了的。

写到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的文学思潮和运动方式加以概述，以为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提供坐标。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主要有这么几种样式：

一是社会动员式，其经典范例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转折处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不仅推动中国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弃旧从新，在这一社会动员过程中，不仅李大钊、陈独秀等思想明星登上历史舞台，鲁迅、胡适等文学大家也登上历史舞台，而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沈从文、冰心等现代文学大家，也无不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中之所以群星闪烁，竞相生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文化运动”为这些“星星”展开了一片天空。

二是政治动员式，其典型范例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催生的“革

命文学”。19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革命也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为了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毛泽东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做了《讲话》，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等革命文艺的核心问题，在延安文艺界，在全国革命文艺界，引发巨大反响，开启了“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埋下伏笔。“延座讲话”后，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延安鲁艺集体创作并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阮章竞的长篇叙事诗《漳河水》，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应运而生，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而新中国后“十七年文学”期间诸如“三

红一创”(《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等经典作品,亦可视为这一文艺思想的瓜棚豆架上结出的硕果。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的革命文艺是世界文艺史上一个独特而发光的存在的话,那么,“延座讲话”可以说就是蓄电池。新时期之后,尽管一些作家对这种文艺动员方式心存忌惮,宣称自己的创作是“纯文学”,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文学并不“纯”,而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可视为这种“政治动员”似的文学样式的产物,尽管其运作方式巧妙了些,留下的痕迹模糊了些。比如,“伤痕文学”就是“新时期”呱呱坠地带来的响亮“啼哭”。比如,“改革文学”就是国企改革前夜阵痛带来的“骚动与喧哗”。

三是作家-评论家互动式,其典型范式是“先锋文学”的发轫及发展。1990年代初,一些小说家和评论家深感于文学与现实之牵连与羁绊,因而,进一步挑战陈规,提出了“先锋文学”这一概念。伴随着马原、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一大批特立独行的作家携带着更加特立独行的小说文本登上文学舞台,伴随着吴义勤、陈晓明、张颐武、陈思和等评论家的理论跟进,这一文学的话语“暴动”取得了阶段性成功。现在,上述作家与评论家,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文学名家,而“先锋文学”这一文学运动,无疑是他们登上文学巅峰的有力踏板。需要补充一句的是,1980年代中期之后,这一文学运动样式是文学界

最为“流行”的样式,比如,“寻根文学”、“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思潮,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先锋文学”大同小异。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概而言之,一方面文学界主体性的空前觉醒,文学界不愿再“屈从”于政治或其他权威,而自觉地做自己的主人,要求将“文学还给文学史”、“将文学史还给文学”。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中国社会的重心已经由“政治”转向“市场”,由“文学”等“虚学”转向经济等“实学”,“政治”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意识地退出了文学领域——关于这一变动的后果,笔者在下边还要进行分析。

四是期刊策动式,其典型范式是“新写实”文学思潮之发轫。事实上,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自现代文学萌生以来,许多重要的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基本上都离不开文艺期刊的策划和策动,比如,“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的关系。退一万步讲,即使文学期刊没有直接参与文艺思潮与文艺运动,他们也是文艺思潮和文艺运动得以发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载体,因而也是其重要推手。但是,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即使在今天,文艺期刊的功能极大地退化了,几乎沦为单纯就稿子谈稿子的“手艺活”或“手工活”,策划和策动,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而在此前,这却是文艺期刊的重要功能之一,

也是办刊者的重要素质之一。在这一方面，新时期以来，《钟山》杂志与“新写实”文学思潮的关系，可为经典案例。“新写实”是几乎与“先锋文学”同时产生的文艺运动，这一运动萌生之初，对其品格，评论界把握不定，有的将其视为现实主义的“回归”，有的将其视之为“自然主义的”的萌发，有的将其勾兑为“现代现实主义”或“后现实主义”。对这个文学思潮予以破题的，是大型文学期刊《钟山》杂志：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并在“卷首语”中对“新写实”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新写实小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虽然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1989年10月，《钟山》又联合《文学自由谈》召开“新写实小说”研讨会，为其推波助澜。由此，“新写实”形成气候，方方、池莉、刘震云等作家，也借着这一思潮，登上文坛前沿。这一事例表明，文艺期刊在文学思潮和运动方面，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可惜的是，盛景不再。具体原因，接下来笔者还会提到。

在笔者的视野中，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大致就这几种范式，但是，无论哪一种范式，其作用都不可忽视——实际上，大致自1990年代以降，在一种“纯文学”的整体氛围中，我们已经忘记了历史上文学思潮和运动对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因而，无知且本能地忽视了其对推动文学发展的现实作用——如果略微梳理一下，我们会发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有“才华”、有“气象”的作家，多多少少，都与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有关。在这个方面，王安忆以及以她为代表的“50后”，可谓得天独厚。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光”他们没有直接沾上之外，革命文艺运动和思潮以及新时期之后各种文艺思潮的“光”，他们基本都沾上了。“革命文艺运动”对他们而言，是一份“被背叛的遗嘱”，而他们之所以“背叛”这份“遗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这份“遗嘱”太熟悉了，借用今天一句嬉皮的话说就是，他们对此“审美疲劳”了，但无疑，这种文艺思潮的因子，已经深入到他们的文学神经中去了，即使“背叛”，也挥之难去；而新时期之后的各种文学运动和文艺思潮，许多“50后”甚至是策动者，即使不是策动者，也是参与者，即使不是参与者，也是旁观者，他们得风气之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笔者看来，王安忆他们之所以有“才华”和有“气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经受了众多文学运

动和文学思潮的洗礼，没有这种洗礼，很难说“才华”和“气象”就会附他们的体。说白了，他们身上的“才华”和“气象”，在相当程度上，是“老文学运动员”的“才华”和“气象”。这件事反过来说也成立，即：为什么“70后”作家在写作技术上相当成熟了——他们也已人到中年——可他们给人的感觉却是没有“才华”和没有“气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得到过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支持。你想想看，在陌生的城市里，一个拿着手机看着最新版老虎地图的罗圈腿，跟一个了不知南北的竞走运动员，谁走得更快呢？有些东西看起来很深奥，可道理其实很简单。

接下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了：文学是如何失去运动与思潮的？

客观地看，像“新文化运动”这样社会动员式的运动与思潮，是大转折时代社会应急反应的文学显现，属于天上掉下来的机遇。况且，对于生逢其时的普通民众而言，这样的大转折时代，往往是痛苦的时代，是灾难的时代，是流血流泪的时代，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国家不幸诗家幸”，为了文学的利益而希望它到来，只能在它既来之的情况下，让文学因时乘势发出应有的光和热。因为可遇不可求，这样的文学运动和思潮样式可以暂且说到这儿。

至于政治动员式的文学运动与思潮样式，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下，可以解读为国家动员式的文学运动与思潮样式。这样的

文学运动与思潮样式，相信经历了新时期以来文学演变的文学人士，或者没有亲历这样的过程，但对这一阶段的文学史比较熟悉的人，应该不陌生。但是，随着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完成，发展，或者说“经济”，成为国家的重中之重，在某种程度上，国家适度退出了对文学或文艺的策动或动员——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文学边缘化的原因之一——而相应地转变成为文学或文艺的“管理者”。这一角色转换，对文学或文艺的影响不可谓不重大，因为，对“管理者”而言，“求稳”是第一位的，在“求稳”这个大前提下，能有所发展，那再好不过，即使没有发展，只要有了“稳”，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在这样的“管理”心态下，慢说主动策划、推动文艺运动或思潮，就算出现文艺运动或思潮，有关“管理”部门不紧张兮兮就已经很难为他们了。因而，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通过政治或国家动员的方式推动文艺思潮出现或发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在一切以发展/经济为要务的大环境中，文化也被极大程度地产业化了。这一产业化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就有关方面而言，一谈到文化发展，想到的往往是文化产业项目，说白了，就是实际利益，而文学创作这些相对“虚”的、精神的的东西，则往往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不忘得精光就算好的，哪儿还谈得上推动？当然了，如果有人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有关部门马上也会注目文学，不过，说句实在话，这位得奖人在他们眼中大概也就是一座材质昂贵的奖杯而已。近年来，国家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十八大之后，“中国梦”也成为关键词，这无疑表现出一种了不起的抱负，但这一“软实力”和“中国梦”如何落实为文学、文艺，在目前看来，仍然不敢马上乐观。但愿它们不要再次沦为文化产业的附庸。

文化产业的第二个后果是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上文说过，“80后”可谓消费主义在中国最为成功的文学策划和文学行动。想想也的确惊人，当下的文化产业还停留在“挖大坑”、“盖大楼”、“修新如旧”的阶段，几个“书商”——绝非贬义——竟然策划出这么大的一个文学行动来，不仅推出了一系列成功的文学“产品”，引发轰动效应，而且还推出了一些闪亮的文学“新星”——这也是“书商”们的“产品”，而且是最重要的“产品”——其“感知力”和“行动力”绝对不可小觑。现在，这一力量又向影视和网络进军，并已产生初步效应，其后续行动及效果也值得观察。但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一文学行动的目的是“消费”，是“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其传播的文学精神，甚至文学形式，与主流文学都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其带给我们的，往往是文学概念的泡沫化乃至异化。

至于文学期刊，在文学转型为被“管

理”对象的语境下，在文化产业化和消费主义的围堵之下，现在连生存也成了问题，早就没有什么心力去策动文学活动了。现在，许多文学期刊所想的，就是怎样把好作家和好稿子拉到自己手中，让自己在同行中一枝独秀，能更好地活下去，也就是说，现在的文学期刊，早就高度分化了，各自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了。1980年代那种同气连枝、彼呼此应的美好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了。指望这样的文学期刊策划或推动文学运动和思潮，只能说这是奢望中的奢望。说句实话，现在，每年也有很多文学期刊举办活动，要么是颁奖典礼，要么是作品研讨会，在这些场合，也往往“名家荟萃”。但这些，说到底，也只能说是“文学活动”。因为，在相当程度上，这些“活动”就是文学期刊“招商引资”，甚至是“化缘”的成果啊，其间的艰难与不堪，怎一个“惨”字了得？！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会知道作为文学重要载体的期刊的生存状态了。因而，也就不敢对其策动文学运动和思潮、推动文学发展心存幻想了。

在今天，能够决定文学走向的，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河北四侠”这个文学命名背后所隐藏的力量——各级作协或文联。如果关注文学界的活动，我们就会发现，当前大大小小的文学活动，基本上都是各级作协或文联举办的，也就是说，在众多能够策动文学运动和思潮的力量都已退出历

史舞台的条件下，各级作协和文联，几乎成为文学“活动”的唯一主体。当然，在它上面，还有更高的管理部门。实际上，这也是国家适度退出文学或文艺领域，将自己的角色转换为“管理者”的结果之一。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在这样的“管理”之下，大概只能有文学“活动”而不能有文学“运动”。但需要提一句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客观：一方面，无论是在创作前途还是世俗功名的意义上，这些“文学活动”对作家个人都是意义深远的。因为，一是这些文学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作品研讨会——绝非像传闻中的那样是“捧杀”或“棒杀”的现场，而是相当实事求是的作品研讨会。这样的会议，笔者也参

加过多次，绝大多数都能做到心平气和地研讨作品，有优点谈优点，有问题分析问题，客观而公正。这样的研讨，对作家反思、提升自己的创作，当然有重要的价值。二是这样的研讨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评价机制，也就是说，能够由各级作协或文联举办研讨会的作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作协或文联视为文学可能性，因而，以制度性的力量对其加以扶持、推广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而且，能够参加这样的研讨会，往往表明这些作家已被推上了更高的评价平台——这些研讨会是为作家参评重要文学奖项在“热身”呢，一旦“热身”成功，影响自然更大。

在明白这一文学力量对作家的影响之



后，我们必须再次明确，这样的文学力量很难成为文学运动与思潮的推手，因为，这些文学活动的作用本身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推介，推举；一方面是管理、规训。

剩下的，就是“文学界”的自我“拯救”了。可奇怪的是，自1990年代以来，我们就看不到这种自我“拯救”的愿望与努力了。那些“50后”的“老运动员”和“60后”的“中运动员”，要么功成名就，要么气势正旺，已丧失了“运动”的冲动，这完全可以理解，人家毕竟是过来人嘛。也不妨说，属于人家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人家不用说还在努力消化已有资源继续认真写作，就是不那么努力了，只要好整以暇，稳稳当当地“消费”原来的“名望”，也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而且还可以“活”得相当不错。“50后”、“60后”如此，“80后”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说，人家是“贾宝玉”嘛，嘴里含着玉石生下来的，一生下来就被“资本”给盯上了，给“包装”乃至“包养”了，从此告别屌丝，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他们不必再为生活操心，不必再为文学操心——只需为资本操心就行了。换句话说，他们也算“运动”过了，风光过了，用不着“运动”了，可以一心一意谋发展——挣钱——了。不正常的是“70后”以及其他被“遗忘者”，作为在夹缝中生存的一代，其付出的心血不可谓不多，其收获的成果不可谓不少，但在这样艰难的境遇中，他们却不反思这

种困境从何而来，反而有时候用别人的“经”阐释自己的问题，认为是自己写作状态不够勤奋、文学理念不够纯粹、文学态度不够独立导致这种困境的。这实在令人费解。

文学当然是精神性的活动，文学当然也是个人的活动，文学当然也有其自律的审美品格，但我们不要忘了，在这一切之上，也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天空”，这个“天空”就是作家们共同创造的精神、思想、情感、艺术资源——而且，可能每隔一个历史时期，这样的“天空”就需要重新创造，由新的“星星”们创造，也由新的“星星”们共享。而创造“天空”最为重要、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发起文学运动，推动文学思潮，强健文学筋骨，活跃文学头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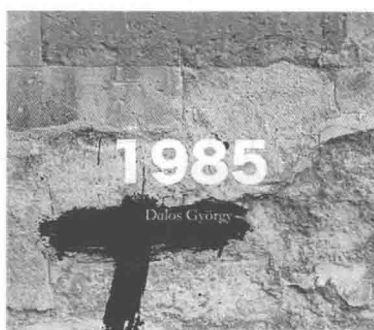
而我们，“70后”等正在老去的“新人”，无“运动”久矣！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首儿歌的歌词：

左三圈，
右三圈，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早睡早起，
我们来运动……

对了，我们来运动吧。再不“运动”，可就真的“病”了。

GEORGE ORWELL



【匈牙利】道洛什·久尔吉 Dulos György 著
金泽民 译

老大哥死了，世界会怎样？

奥威尔《1984》续作

多一个人读《1984》，自然就多了一些保障
《1984》到底该读
自由的星洲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社

